

博物馆工作概论

(初 稿)

文化学院

刊 印 說 明

一九六〇年我院“文物、博物館干部学习班”集体編写了兩本书稿：《文物工作概論》和《博物館工作概論》。由于书稿係學員同志在学习期間匆促写成，一般說来还不够成熟；而《文物工作概論》則更为单薄一些。

初稿写成以后，我們曾印发給一些单位征求意见；一九六一年春天，即組織人力进行研究处理，并請几所博物館提供照片插图；打算待原稿經過反复修改补充以后，正式出版。同年夏天，我院奉令撤銷，各項工作都要迅速办理結束；在这种情况下，原定的出版計劃，就不得不改变了。因此，决定将《文物工作概論》交有关部門作为資料保存；将《博物館工作概論》以“初稿”形式排印出来（不附图片）分发給學員同志作为紀念和参考。

《博物館工作概論》在排印前，我們曾作了一些修改。但因時間匆促，加之对博物館工作的现实情况不够了解，可能有些地方不甚妥当，甚至个别地方还会有錯誤。

我們深深地感到：自从党中央提出“調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針以后，过去对某些問題的認識，已經与当前形势不相符合了。《博物館工作概論》中，也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对許多工作（包括建筑、設備）要求都提得过高、过急了一些。我們相信，同志們在閱讀此书时，对于这一类問題以及其他不尽正确的理論闡述和經驗介紹，一定会注意到的。

文化学院 1961 年 11 月

目 次

第一章 我国博物館事业的发展道路	1
第一节 解放前我国博物館历史的回顾	1
第二节 解放后我国博物館事业的发展	9
第三节 建国以来我国博物館工作的基本經驗	16
第二章 博物館的性质、特征、基本方針和 任务	23
第一节 博物館的性质	23
第二节 博物館的特征	26
第三节 博物館的基本方針和任务	29
第三章 博物館的类型	41
第一节 划分博物館类型的意义	41
第二节 专门性博物館	43
第三节 地志性博物館	47
第四节 紀念性博物館	52
第四章 科学研究	61
第一节 科学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61
第二节 科学研究的内容和重点	64
第三节 科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68
第五章 陈列展覽	73
第一节 陈列展覽的意义和基本原則	73

第二节	陈列展览工作的基本方法	87
第三节	語录和文字說明	106
第四节	輔助陈列品	112
第五节	陈列展览的艺术裝飾	123
第六章	征集工作	134
第一节	征集工作的意义	134
第二节	征集工作的步驟和基本要求	137
第三节	征集工作的基本方法	149
第七章	保管工作	159
第一节	保管工作的意义与工作原則	159
第二节	藏品管理	161
第三节	藏品保护	168
第四节	修复、复制及标本制作	194
第八章	群众工作	205
第一节	群众工作的意义	205
第二节	群众工作的基本要求	207
第三节	开展群众工作的几种主要方法	211
第四节	編輯出版工作	223
第九章	建筑和设备	226
第一节	建筑和设备的特点	226
第二节	建筑的基本要求	230
第三节	家具设备的設計原則	244
第四节	建筑和设备的管理	252

第一章 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道路

第一节 解放前我国博物馆历史的回顾

一、博物馆的悠久历史渊源

博物馆在我国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在古代没有博物馆这一名称，但是，象陈列和收藏文物、进行考古研究等史实，在古书上就有很多记载。如：《论语》中曾提到的鲁国太庙（即周公的庙堂），就是纪念周公这位历史人物的。当时，人们还往往把比较重要的文物放在太庙里，《春秋》桓公二年记载：“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后来，这种形式又有了发展。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曾经记载：“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人们把周公庙、孔庙视为博物馆的萌芽，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它已具有类似纪念性博物馆的雏形了。

文物的收藏工作，在我国也很早就开始了。历代的宫

室、祖庙、武庫等都可以看作是当时收藏文物的地方。例如，《周礼》就曾記載：“春官之职，掌祖庙之收藏，凡国之玉鎮太宝藏焉。”《晋书》“張华傳”提到：“元康五年^①十月……武庫火，……累代之宝及汉高斬蛇劍、王莽头、孔子履尽焚焉。”到了宋代，文物的收藏更加丰富。宋人蔡條在他所著的《铁围山丛談》中說：“政和間^②上方所貯至六千数百器……。”可見藏物之多。为了貯藏这些文物，书中还說：“宣和殿后，又創立保和殿，左右有稽古、尚古、博古等閣以貯之。”对文物的收藏，以后各代都很注意，尤其是到十八世紀清代宫廷的文物收藏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广泛。清代除将历代所收藏的文物，如青銅器、玉器、法书、繪画、古书、瓷器、古錢、古鏡、古印等集中在皇宮外，还大量搜集与制作我国著名的手工艺品，如景泰藍、金銀器、刺綉、絳絲、雕刻、漆器等。

对文物的整理与研究，在很早以前，我国就有不少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績。象司馬迁就非常注意古迹，在他的历史著作——《史記》中充分地运用了自己所搜集的文物資料。如在“周本記”中談到了周公的墓葬所在，“春申君列傳”中記述了春申君的故城和宮室。汉代文字学家許慎利用青銅器上的銘文作了文字变迁的研究。西晋的学者們整理了在汲县战国魏襄王的墓里发现的竹簡，編出了有名的《竹书紀年》。到了南北朝、隋、唐时期，

① 公元259年。

② 公元1111年—1117年。

随着遗迹、遗物的不断发现和收藏的增多,对遗迹、遗物的记录更有着进一步的发展。宋大观初年(公元约1107年),王黼等把皇帝收藏的钟鼎、鉴盘、弩机等八百三十器,摹繪形制、銘文附以考釋,著成《宣和博古图》。宋代,由于收藏古文物的丰富和对器物研究工作的发展,研究金石器的就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金石学。著名的金石学家吕大临著的《考古图》就是金石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他把古青铜器仔细地繪图、測量、考釋銘文、记录出土地点,并联系到历史傳說和諸家的研究意見,加以研究、考证。此外,还有《宣和睿覽集》、《宣和书画集》等都是类似现代博物館藏品目录的著作。清乾隆时期,清理了宫里的旧藏,由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編輯了《西清古鉴》、《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图谱或目录,为我国的历史学、考古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以后,我国研究金石学的范围扩大了,对货币、鏡鉴、磚瓦、璽印和封泥都有了更多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就。在銅器的研究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阮元著的《商周銅器說》和《周乐器說》,对銅器的制作和用途都作了考证。程瑤田的《考工創物小記》是根据古器物解釋《周礼考工記》的,对車、矢、戈、矛、角、爵、钟等进行論证。所有这些研究活动,在旧社会,由于受到时代和条件的限制,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也为近代博物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积累了一些經驗,他們的研究成果,对今天古器物的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

我国对方志的研究也很早。如《书經》的“禹貢”可以看做是关于方志的最早著作。书中記載了我国古代的方域、地质、物产分布等情况。汉代人写的《山海經》詳細地記錄了当时我国山川形势、土地、物产、古迹的情况，内容更加丰富。随着发展生产的需要，以后，各个朝代都很注意方志的研究，著书也更多。隋、唐时期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方志书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到了宋代，方志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門學問叫作“方志学”。明、清以来，編志之風更加盛行。明代張邦政在重修《滿城县志》序言中說：“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研究方志对地方的历史、地理、资源等情况的了解都很有帮助。有关方志的著作則为近代博物館（特别是地志性博物館）进行对地方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資料。

以上所述关于我国古代的文物陈列、收藏和考古研究等活动，虽然在当时是为封建統治阶级服务的，但它們遺留下来的实物和著作，却給今天的博物館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参考資料。

二、近代博物館在我国的出現

二十世紀初期，近代的博物館在我国出現了。十九世紀末，我国有一些主張向西方学习的人物“提倡西学”，“振兴实业”。于是博物館的創建也被提上議事日程。例如1895年上海强学会章程中就主張“开博物院”，并认为“文字明，其义有不能明者，非图谱不显；图谱明，其体有不能明者，非

器物不显。”他們抓住了博物館之有实物这一点，提出：“今創設此院，凡古今中外，兵农工商各种新器，如新式铁舰、輪車、水雷、火器及各种电学、化学、光学、重学、天文、地理、物理、医学諸图器，各种矿质及动植物类，皆为备购，博覽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首先正式办起博物館的是强学会會員張謇。1905年，張謇在南通师范学校开始筹办“南通博物苑”。他在“南通博物苑品目序”中說：“清光緒乙巳以师范教授博物之須有所征也，始营苑于校河之西，徙荒冢千并民居三十許为之，要于举物而已。而需征者广，集物亦頤，民国三年甲寅，乃粗成天然、历史、美术三部，品物凡二千九百有奇。”这种博物館在宣傳現代自然科学方面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这种博物館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統治下是很难得到发展的。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1912年，反动政府在北京国子监旧址，筹办了历史博物館；1914年，利用故宮前三大殿和文华、武英两殿成立了古物陈列所；1925年，成立了故宮博物院。1933年，在南京筹办了国立中央博物院。上海、天津、浙江、河北等地先后也有博物館的建立。

由于解放前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那时候，除了統治階級所办的博物館以外，还有帝国主义国家为奴化中国人民思想、掠夺中国資源和进行間諜活动而举办的博物館。如1874年，英帝国主义在上海成立的“亚洲文会博物院”；1883年，法帝国主义在上海成立的“震旦博

博物院”，1916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連成立的“滿蒙資源館”，在青島成立的“山东产业館”；美帝国主义在1919年成立的“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館”等。这些博物館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也是它們掠夺我国文物的前哨。他們到处打着博物館的旗号，盗窃我国的珍贵文物，破坏我国的历史文化艺术遺產。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勾結反动政府、封建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古玩奸商，把我国的珍贵文物大量地盗运出口。而美帝国主义則是掠夺最多的头号盗窃犯。

早在1797年，販卖鴉片到广东的美国商販，就已在广州一带搜刮我国的文物。此后，美帝国主义通过各种阴谋活动，进行秘密的或公开的劫掠，不仅使我国敦煌、云岡、龍門、天龙山、南北响堂山、巩县石窟寺等处历代石窟艺术的精华遭到史无前例的浩劫，并且还盗走了数以万計的古画、古书、銅器、玉器、陶瓷、雕刻等历代艺术的珍品。

美帝国主义强盜对我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之后，还摆出一付人类文化保护者的面孔，进行詭辯，企圖为自己的罪行开脫。如大盗窃犯普爱倫和北京的古玩奸商勾結，把我国河南龍門石窟最精美的北魏石雕“帝后礼佛图”凿走，彻底破坏了这个著名的艺术雕刻。可是，这个普爱倫在他所写的“紐約市艺术博物館所藏中国雕塑”一文中却說：“1933—1934年之間，这浮雕被人凿碎盗走后开始在北京古玩市場出現，当时只有两个美国博物館（指紐約市艺

术博物館和納尔逊艺术博物館)在努力挽救它。”可是,事实却又是怎样呢?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我們在北京古玩奸商岳彬家里,发现了普爱倫亲笔签名所訂立的凿碎“帝后礼佛图”的合同。因此,到底是被誰凿碎盗走,是誰“在努力挽救它”,昭然若揭了。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强盗的邏輯,真是无耻之极!給予那些偉大艺术品以惨劫的难道不正是美帝国主义强盗嗎?美国的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館、紐約市艺术博物館和費城艺术博物館等許多博物館就是靠掠夺我国和其他国家珍貴的历史文物起家的。这些博物館实际上都是赃品罪证館。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所炫耀的“西方文化”的内容之一。

解放以后,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历史文物,虽然无法再像解放前那样肆无忌惮地盗窃掠夺;但是,盗窃阴谋并没有完全停止。1961年春天,美帝国主义和蔣匪帮勾結,把蔣匪帮盗运台湾去的珍貴文物的全部精华,凡九类共二百五十三件,借去“展覽”,即其显例。此外,帝国主义还在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勾結个别坏分子暗地盗窃我国历史文物和貴重图书出口。因此,我們必須时刻提高警惕,繼續打击帝国主义对我国文物进行盗窃的各种阴谋活动,并与之坚决斗争。

三、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博物館事业

党向来是重視文物、博物館工作的。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候,有些革命根据地

和解放区就倡議举办过博物館或展覽館。在极其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里也是非常注意收集、保护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开展陈列展覽工作。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曾提倡建立革命博物館，收集、陈列革命紀念物及战利品，通过革命博物館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鼓舞革命斗志。有些老革命根据地还建立了革命陈列館，专门保存革命烈士的遺物。抗日战争时期物质条件很差，但是，仍然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积极地举办各种展覽会向群众进行宣傳教育。如：1939年，陕甘宁边区举办了规模巨大、为期十二天的工业展覽会，展出边区的工业产品二千余件，观众数达万人。我国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东同志还参加了開幕典礼并讲了話。第二年，繼續举办第二届农工业展覽会，展品增至七千余件，共展出十七天，观众三万余人。1943年的生产展覽会則和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开幕，展期二十天，观众五万余人。在延安举办的这几次展覽会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举办的各种展覽会，成为总结与交流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設經驗，贯彻党的方針政策，提高群众革命觉悟的工具之一，在推动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建設、对敌斗争及各項工作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革命圣地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博物館筹备委员会”积极开展搜集革命历史文物和建館的工作。在各个解放区，也很重視这项工作。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在哈尔滨建立东北烈

士紀念館。紀念館里陈列了在党的领导下东北地区的人民英勇的革命斗争史迹和革命烈士的遺物。通过这些陈列展览使广大的参观者受到了深刻的革命傳統教育。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博物館，是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之一，在中国人民的偉大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第二节 解放后我国博物館事业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博物館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也和其他文化事业一样，有了巨大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博物館事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一、从1949年到1952年是博物館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解放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相继成立了专门管理和保护文物事业的行政机构。頒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令、办法。同时，接管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所举办的博物館，并对它进行改造。积极清除和剔出在陈列中具有封建、买办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的陈列品，肃清这些思想在博物館中的影响。党和政府指出博物館的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人民大众正确地認識历史，認識自然，

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与生产热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組織陈列展覽，配合一定时期的政治运动，向广大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教育。对博物館的干部队伍也进行了整顿。根据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原有的工作人员組織他們参加土改、鎮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各項政治运动，提高其思想觉悟。在博物館的組織机构方面也进行了整顿，不断地調整和补充藏品，建立群众說明工作制度。这样，博物館就在本质上起了变化，逐步成为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为党和国家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宣傳教育的工具。在这个期間，博物館与有关部门合作举办了大量陈列展覽，如关于土地改革、鎮压反革命运动、反映抗美援朝的偉大斗争以及宣傳过渡时期总路綫等的陈列展覽。通过这些陈列展覽教育了广大群众，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人們对博物館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再认为博物館是“古董摊”、“古玩鋪”。博物館事业呈现出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新面貌。

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統治，曾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在长期的斗争中遺留下大量的革命遺迹和革命遺物。解放后，这些遺迹和遺物，就成为向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教育的工具之一。因此，在改造旧館的同时，就开始积极筹建以恢复革命遺址原状为主要內容的革命紀念館和以反映我国革命斗争历史为主要

任务的革命博物館。在这个时期，中央成立了中国革命博物館筹备处；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紀念館；在革命圣地延安，成立了延安革命紀念館。为了紀念我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偉大旗手鲁迅先生，在北京、上海、绍兴三地成立了鲁迅博物館（或故居）。在党的领导下，这种革命博物館和革命紀念館，在我国各地逐步地建立起来了。

在改造旧館的基础上，各省、市出現了一批新筹建的地志博物館。筹办地志博物館，是我国博物館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它使博物館事业与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結合得更紧了，它能更好地为完成国家和地方的各項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任务服务。

到1952年底，全国已有博物館40余所，比以前增加了将近一倍。不仅是数量的增多，更重要的是这些博物館的性质和解放前的博物館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它成为党和国家重要的宣傳教育工具之一。

二、我国从1953年起，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計劃建設时期。在这期間，博物館事业有了更合理、更有計劃的发展，并进一步配合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举办了一系列的陈列展覽。同时，也和存在于博物館事业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道路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是我国博物館事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首先表現在整頓巩固地志博

博物館的工作上。地志博物館是全面而又有重點地反映地方自然、歷史發展、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特別是通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陳列展覽，配合地方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高了廣大人民的政治思想覺悟。但是，有些人卻認為國民經濟建設的陳列展覽沒人看。這些人也就對搜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物和組織“社會主義時期之部”的陳列展覽不感興趣，不願意地志博物館為政治、為生產服務。我們對這種思想進行了批判，堅持貫徹執行地志博物館的方針、任務。如山東、內蒙古及其他省、自治區博物館在這期間都相繼完成了陳列或者舉辦地方社會主義建設的展覽，並且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歡迎。在整頓和鞏固地志博物館的過程中，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在建立紀念性博物館的工作中和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也是十分尖銳的。紀念性博物館應恢復紀念建築及其內部的歷史原貌，這樣才能以真實的革命的歷史情景向觀眾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但是有些人在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卻忽視原狀布置的作用，一味追求所謂規模氣魄。對這種思想進行了嚴肅的批判以後，紀念性的博物館才得到健康的發展。全國新建的紀念性博物館，少部分是紀念古代人物的，如杜甫、蒲松齡等。大部分是紀念近代和現代革命歷史事件和革命人物的，如毛主席的韶山故居，孫中山在廣州、上海的故居，南京太平天國紀念館（1961年改為太平天

国历史博物館), 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 南昌八一起义紀念館, 瑞金、西柏坡等地的革命紀念館等。

为了总结我国博物館工作的成績和交流經驗, 进一步明确博物館工作发展的方向, 以及响应党所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1956年5月, 文化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博物館工作會議。會議期間, 交流了經驗, 討論了博物館事业发展的远景规划, 肯定了我国博物館的基本性质和基本任务, 明确了它是党的宣傳教育机构, 科学研究机构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遺存、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所。这次會議的召开, 使得博物館工作的基本方針、政策、原則进一步明确, 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大大地鼓舞了全体博物館工作者的信心,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博物館事业稳步地向前发展創造了条件。

但是, 有一小撮资产階級右派分子, 頑固地坚持资产階級的政治立場, 他們一再拒絕接受党的領導, 不願意走社会主义道路, 极端仇視社会主义的博物館事业。因此, 他們趁1957年党开始进行偉大的整風运动的时候, 就认为“时机”已到, 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串通一气, 对博物館事业进行惡毒的攻击, 叫喊甚么“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教条,”等等謬論, 阴谋篡夺党对博物館事业的領導权。要不要党的領導, 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我国博物館事业中就很明显地摆出来了。广大博物館工作者通过鳴放辯論、摆事实讲道理等方式对资产階級右派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彻底地揭露了他們的政治阴谋,